精准有力回应市场“最关切” 中国经济暖意不断

■ 国际锐评

宏观经济、房地产、中概股、平台经济……一系列市场最关切的问题，在16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上得到了一一回应。正如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这场会议及时、精准、到位，传递出中国政府稳预期、稳外资、稳发展的积极信号，有力提振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在外部环境不确定、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压力下，中国金融市场过去几个月承压明显。关键时刻，金融委这场会议直面扰动市场的关键问题，强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指出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这些政策面支持信号稳定了市场预期，有效缓解了市场担忧情绪。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对《国际锐评》表示，这场会议传递出的信息展现出“中国顶层设计在短期动荡中的底气，以及中国经济金融迎难而上的韧性”。

不难看出，中国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有冷静深入的分析判断，做好了“爬坡过坎”的准备，同时对中国经济禀赋实力以及战胜困难挑战有着充足信心。

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已经证明其具有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巨大活力。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在疫情之下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实现8.1%的GDP增长同样亮眼。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仍在稳步推进。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经济恢复好于预期，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基础。彭博社评价说“疫情之下，中国经济强劲开年”。

这其中，消费领域的复苏明显改善。1至2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7%，远高于路透社采访的经济学家们此前3%的预期。消费复苏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去年中国经济8.1%的增长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了5.3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65.4%，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第一拉动力。

此外，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工业生产、投资和进出口等领域都实现了较快增长，同时保持了就业和物价的稳定。这表明，中国经济运行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势头，经济向好的基本面没有也不会改变。这正是中国政府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设定在5.5%左右、实现“高基数上中高速增长”的底气所在。

当前，全球疫情扩散蔓延，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经济持续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面对国内国际的多重不确定性，中国在政策方面仍需未雨绸缪。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不久前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稳”都是关键字。昨天的国务院金融委会议也强调要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表示将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金融机构必须坚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这些让外界看到，中国宏观政策空间和工具储备充足。市场普遍预期，中国后续支持稳增长的力度不会减弱。而金融系统更好地为实体经济“供血”，将促进良性循环，护航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助力把中国经济复苏的“暖意”传递到全世界。

美国上世纪的“洗脑实验”

■ 廖省：林越

2021年12月27日，一部名为《寻找自我》的纪录片在丹麦播出，系统而真实地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上世纪在311名丹麦儿童身上进行精神控制实验的丑闻。该项实验的代号为MK-ULTRA，纪录片马上在全球的舆论界掀起了滔天巨浪。

《环球时报》查阅资料发现，《寻找自我》展现的内容仅是中情局进行非法人体实验的冰山一角。2010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向危地马拉总统道歉，因媒体爆出60多年前美国对约700名危地马拉囚犯和精神病患者进行“实验”的黑幕，引起轰动。俄罗斯情报史专家亚历山大·科尔帕基迪说，这是西方“民主”的标志性风格——侵犯人权、为所欲为地进行非法行动，几十年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假惺惺地“道歉”。

美国中情局1953年设立MK-ULTRA计划。这项目与冷战有关，主要目标是研究如何操纵人的意识，给人“洗脑”，从而在审讯中获得口供。从上世纪50年代起，MK-ULTRA计划持续了20多年，该计划的负责人、中情局化学家西德尼·戈特利布认为必须先毁掉实验对象已有的思想意识；然后用一种方法将新思想灌输到实验对象的脑里。

《寻找自我》纪录片导演、MK-ULTRA计划受害者之一佩尔·温尼克（Per Wennick）讲述1960年的遭遇。当时他11岁，与同住在哥本哈根一座孤儿院的几名小伙伴，被每人16丹麦克朗（现在约19美元）的报酬骗去“做点好玩的事”。“他们粗暴地把电线接在我们的腿上、胳膊和胸口上，给我们戴上耳机，我的耳朵被尖锐而嘈杂的噪音充斥着，难受极了。”实验第一年，美国就提供相当于460万丹麦克朗的资助。

科尔帕基迪对记者表示，参与MK-ULTRA计划的包括44家教育机构、15家药理和化学研究公司、12家医院和诊所，以及3所监狱。更令人发指的是，计划还将魔爪伸向更多地方，实验对象包括囚犯、甚至平民，而他们有的瘫痪、有的被折磨至死。

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在其《首席毒师》一书披露，美国授予戈特利布特殊权力，寻找实验对象，并掌握“实验品”的生杀大权。他聘请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战犯石井四郎参与实验。二战结束后，因美国的阻挠，石井并未受审。书中提到，MK-ULTRA计划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的秘密项目之一。

艾伦·霍恩布鲁姆等合著《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的儿童医学实验秘史》（Against Their Will）一书提到，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亨利·莫里（Henry Murray）的很多研究是代表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进行的。二战后他回到哈佛大学，并担任中情局顾问。1958年莫里在哈佛大学进行心理应激研究，多名哈佛学生成为他的实验对象，被无端施以人格羞辱；其项目与MK-ULTRA计划有干系。美国政府以道德人权控告纳粹医生所进行的野蛮实验和伪科学研究，讽刺的是，美国所做的也绝非什么好表率。

书中以1969年的一项研究为例称，“在已经不堪重负的儿童身上继续施加重压的项目简直不计其数。”实验室对数名智障儿童使用不同程度的厌恶疗法，矫正他们的“自我毁灭和精神病行为”，实验决定尝试疼痛冲击法，即用一根30厘米长的刺棒对儿童的腿部进行1400伏特的电流冲击……”还在一家名为弗纳德德的儿童收容所进行辐射实验，从1940年开始的20多年，研究者在孩子的牛奶掺入放射性同位素。研究者甚至将孩子当成介于猩猩和人类之间的某种“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电击疗法。

美国政府1973年正式停止MK-ULTRA计划。公开信息显示，中情局即时下令销毁有关这一计划的官方文件。1975年，美国国会丘奇委员会揭露了MK-ULTRA计划。两年后，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与该计划有关的其他两万份文件被解密，引人注目。

《CIA的医生们：美国精神病学家侵犯人权的行为》一书作者、加拿大精神病学医生科林·罗斯叙述，他于1991年获得进入中情局阅览室的机会，阅读了与MK-ULTRA相关的文件。“问题在于，1973年之后的事，都归于机密。”“美国一流大学存在大量违反医学伦理的行为，在20世纪后期，这种实验都被转移到了私营部门”。

罗斯建议制定相关的国际协议，建立国际机制进行监督。美国的人均囚犯数比其他国家多，在美国特殊级别的监狱，仍可能进行违法实验，“有记录表明，在加州瓦卡维尔的一所监狱，有针对囚犯的精神控制实验，美国中情局文件中对此有记录。”

科尔帕基迪称，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美国人权活动家曾多次试图获得有关这一计划的完整信息，但每次获得的都只是部分信息。”因美国人非常善于隐藏信息。MK-ULTRA计划期间，中情局特工弗兰克·奥尔森被发现死于一家酒店窗外，当局说他是从窗户跳下自杀，但他的儿子坚持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奥尔森是被杀死后扔出窗外的。“也许中情局这样做是为了掩盖其行动，因为奥尔森想揭露MK-ULTRA计划。”

俄罗斯很多专家都在讨论新冠病毒起源于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可能性，科尔帕基迪意味深长地说：“我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这种猜想，如果多年后美国再次‘道歉’，我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只是如果以前他们是向数百名或者更多受害者道歉，那么未来，他们将不得不向整个人类道歉。”全世界人民都期待人权平等的正义和真相！

风火纸

■ 牙律：辛韵吟

很早以前，中国南方靠海的一个小渔村里住着一家渔民，村民管称为老周家。老周夫妇育有两个儿子阿伟和阿龙，虽然生活贫苦，一家四口也能安安乐乐的过日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幸老周一次出海打鱼时，竟然一去不复返，周妈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每天傍晚站在海边苦苦等待着，都等了个把月也不见老周的踪影。

从此抚养孩子的重担就落在周妈一人身上，心性倔强的周妈从不曾向左邻右舍乞讨什么，每天在海边一边带孩子，一边帮忙渔民们工作赚点帮佣费，也算能把孩子勉强拉扯长大了。

阿伟和阿龙成年后，两兄弟跟村里一些青年到县城帮人打工至今也已五年了，凭他们的诚实耐劳，尤其对周妈的孝顺，两兄弟都得到老板的嘉奖。后来经媒婆的介绍娶了另村两个如玉似花的两姐妹小娟和小云，大家都说周妈好福气，两个儿子孝顺，两个媳妇都跟婆婆很合得来。

成家后，两兄弟照样去县城打工，说好一个月回一次家，反正如今老妈有两个媳妇作伴，他们也放心的出门打工了。

有一天，姐妹俩接到娘家来信，说大后天要给老爸举办七十大寿，希望她们并女婿能回家给老爸祝寿，两个姐妹着急商量着该怎么办？姐姐小娟说；“如果我们两人都回家，婆婆让谁照顾呢？”

妹妹小云说：“不如托巷尾的二婶给婆婆作伴，反正她也一人在家，每天无所事事。”

姐妹俩趁婆婆睡午觉时，去二婶家请她在她们回娘家时帮忙照顾婆婆。二婶为人爽快，况且平时跟两姐妹都很要好，就一口答应了，还打趣的说道：“你们放心回娘家吧！你们婆婆有我照顾，回来时可别忘了给二婶带礼物啊。”

姐妹俩高兴的说道：“那当然，礼物少不了您的，二婶，谢谢您了。”

姐妹俩高兴的回家，见婆婆已睡醒，在院子里乘凉，小娟走过去说：“妈，娘家来信说大后天要给老爸举办七十大寿，要我们回家一趟，您说行吗？”

周妈听到愣了好一阵子，说道：“你们俩都回去，阿伟阿龙短时间又不会回来，那妈一个人怎么办？”

小云从背后搂着婆婆说道：“那您也跟我们一起回娘家吧！”

周妈说：“不行，不行，妈这把年纪可经不起路上折腾，上回去你们那儿提亲回来都病了一星期。”

小娟说：“妈，别担心，我们已跟二婶说好了，我们不在的时候，由她来照顾您，我们在娘家也不会住太久，少则五天，多则一星期，就回来了。妈，您就答应我们吧！人生有多少个七十岁，我们不回去给爸祝寿，亲友邻居会说我们闲话的，对吗？”

周妈想了一下，说道：“好吧！你们也难得回一趟娘家，这不有二婶，去吧！”姐妹俩听到婆婆答应她们回娘家，高兴的搂着婆婆叫了起来同声问道：“妈，您要什么东西，我们回来带给您。”

周妈一来想试试她们的孝心，也想试试她们的智慧，就说：“妈这大把年纪，吃也吃不了多少，你们回来时，给妈带来一个风做的纸，和一个火做的纸，别忘了啊！”

姐妹俩一时高兴过头，也没仔细想想婆婆的意思，隔天打点好行李就租辆马车高高兴兴的回娘家。

老爸寿庆办完了，姐妹俩本想在娘家多住几天，老爸老妈提醒说：“该回去了，放你们婆婆一人在家也怪可怜的。”

姐妹俩打点好了行李又租辆马车准备明天就回家了。

小云提醒姐姐说：“姐，咱给婆婆的礼物呢？”

小娟一时愣住了：“对呀，我怎么给忘了？我记得是一个火做的纸，一个风做的纸，我们出门找找吧！”

两人到市集去问，可有这样的东西卖？大家都摇摇头，不明白她们的意思，姐妹俩找遍了市集，疲倦的在市集旁一个大树底下坐下来休息，两人都急得哭了起来。

这时，一个看来十来岁的小男孩走过，看到她们俩，好奇的问道：“两位姐姐，你们是哭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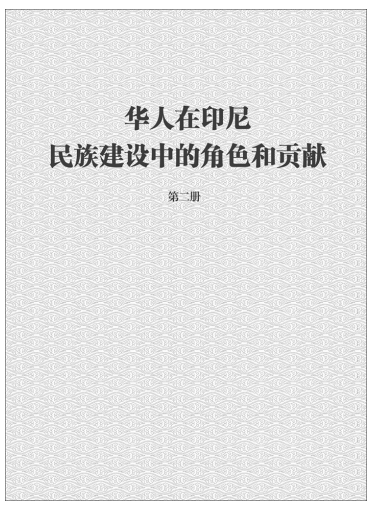
姐妹俩说出了她们的难题，小男孩也跟着坐下来，说道：“别哭了，咱们三个人一块想，应该会想到的。”

太阳快下山了，小男孩突然若有所思的叫道：“有了，有了。两位姐姐跟我来。”就拉着她们往市集跑，来到一个卖艺术品的摊子时，顺手拿了一个纸做的灯笼说：“瞧，这灯笼里的蜡烛点上就有火了，这就是火做的纸。”又拿了一把扇子，在姐妹俩面前搧风说：“瞧，这就是风做的纸。”姐妹俩高兴的跳了起来，立刻将灯笼、扇子买下付了钱，并一再谢谢那小男孩，就高兴的回去了。

大清早，姐妹俩拜别老爸老妈上路回家了，马车一路颠簸终于到家了，婆婆在院子里盼望着，见到她们俩回来，高兴的拉着她们俩的手说道：“你们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妈要的东西都带来了吗？”

小娟拿着灯笼将里面的蜡烛点上给婆婆看，小云拿着扇子给婆婆搧风，两人异口同声的问道：“妈，我们带来的礼物合您的意思吗？”

周妈高兴的笑了起来，含泪的搂着她们俩，无限感慨的说：“你们都猜到了，你们都是妈的好媳妇儿，是妈的好女儿。”



交融的努山达拉美食文化（1）

■ 安德列阿斯·玛尔约多（ANDREAS MARYOTO）

从食材原料引进和菜谱更新，到食物加工和烹调技巧改进，中国美食文化对印尼美食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容否认。在印尼人的日常饮食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影响的痕迹，如杂菜、炒饭等菜式、揉豆腐脑（Adonam Tahu）的工具等加工和盛放食物的器皿以及碗筷等餐具。

这些影响来自第一代移居印尼的华人。他们不仅介绍了中华美食，还在吸收当地及欧洲美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华美食。他们的后代在美食界崭露头角，成为了厨师、菜谱及烹饪书籍的出版商和作者。

其中，爪哇岛值得特别关注。一般来说，中华料理会与当地美食和食材结合，春卷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春卷的制作方法、形状以及名字都带有中华美食文化的特征，但甜甜的味道和丰富的馅料却极富爪哇特色。还有几样中华料理，其他族群对它们的贡献反而比华人更大。例如爪哇熬汤面（Bakmi Godog Jawa），通常由爪哇人售卖。在沃诺梭波县（Wonosobo），卖昂格乐面条（Mie Ongklok）的小贩通常也都是爪哇人。

在其他地方，如北苏门答腊，那里的中华美食相对来说跟中国较为相似。在棉兰及其周边地区的各类餐馆和商店中，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福建捞面（Lomi Hokkian）、各式酥糖（叮叮糖、顶顶糖、铛铛糖、咚咚糖、通通糖、乒乒糖、乓乓糖和砰砰糖）和各式蜜饯果脯。

这一情况从侧面印证了人类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当少数族裔文化进入主流文化时，将会同化和融合主流文化，正如爪哇岛上发生的情形。相反，如果少数族裔文化与另一少数族裔文化相遇，这两种文化将会共存。北苏门答腊的中华美食文化就是很好的例子。

除了给印尼带来食材和食谱外，长期以来，华人在促进印尼美食文化的发展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努山达拉美食文化交相互融的一部分。

食材与烹饪技巧

在移民到努山达拉时，华人带来了很多食材，其中包括主食和其他食材。有观点猜测，花生、绿豆和一些蔬菜等最初是由中国传入，而如今在努山达拉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

食材传入努山达拉的确切时间尚未可知。曾在5世纪到访过这里的法显（Fa Hsien）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信息。继法显之后来此的中国人则记录了关于爪哇食材的重要信息，如酒、辣椒、棕榈、米、豌豆、木瓜、甘蔗、芋头、胡椒、苏木、椰子、家禽以及水牛等。

宋朝（960–1279）文献中发现的关于豌豆记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文献可以说是中国大陆食材对印尼影响的佐证，因为豆类植物多发现于亚热带地区。此外，关于苏木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这种树木虽生长在爪哇岛，但却由华人想出来用其入药。

关于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文献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饮食文化传播到印尼的资料。该文献提及多种食材，例如豆芽、小麦和各种水果。据推测，下西洋时，为了给郑和舰队补给粮食，舰队运用了一系列的粮食生产技术，其中包括豆腐、蜜饯果脯、酱油、虾酱等的制作，壮阳药（即春药）的生产，以及鱼类的保鲜防腐手段。

丹尼斯·伦巴（Denys Lombard）收集了一份由华人移民从中国带到爪哇的食材名单，其中包括萝卜（Lobak）、烧仙草（Cincau）、菜心（Caisim）、龙眼（Lengkeng）等。在这些食物当中，绿豆和大豆是最主要的商品，因为它们是蛋白质的来源。从豆芽种植，到豆腐和糕点制作，绿豆和大豆的使用促进了豆制品加工工艺的发展。在一块公元902年的石碑上，刻有大豆和豆腐等字样（Lombard，2005），这说明在移民早期，华人就已带来了豆子。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